

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依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李竹¹ 吴卫^{1, 2} 王兆峰¹¹

(1.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 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1;

2.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 中国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 文章基于 2002—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利用回归模型分析总体和分区旅游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判断其拐点, 运用 B-K 中介效应探讨总体、分区和分等级旅游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 ①研究期间, 长江经济带总体旅游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率呈稳健“N”型曲线关系, 拐点分别为 RD 值 6.24% 和 13.44%。②中、西部呈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 东部呈不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③总体旅游产业依赖度通过物质资本投入、对外开放和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率产生促进作用, 通过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产生抑制作用; 东中西部传导因素影响强度具有差异。④较低和低旅游产业依赖度区通过“红利效应”传导机制促进经济增长; 中等旅游产业依赖度区表现为传导机制转变特征; 较高旅游产业依赖度区通过“挤出效应”传导机制抑制经济增长; 高旅游产业依赖度区存在向“复兴作用”转变的趋势。

【关键词】: 旅游产业依赖度 旅游促进与抑制 红利效应 挤出效应 传导机制 长江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 F5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22) 05-0223 - 10

长江经济带既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又有雄厚的工业和制造业基础, 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2014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标志着长江经济带被正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 长江经济带经济总量稳定增长但增速放缓, 至 2018 年底, GDP 增至 40.30 万亿元; 同时旅游产业不断发展, 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据统计, 2018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分别约为 70.22 亿人次和 8.32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3.34% 和 17.83%, 其中旅游总收入约占 GDP 的 20.65%。因此, 探讨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依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是否存在旅游资源诅咒现象、传导机制是什么等问题, 对长江经济带未来旅游和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文献综述

旅游发展能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旅游研究领域最为经典的内容之一, 也是诸多学者争论的热点问题^[2]。自 2001 年“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假说”(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 TLGH) 提出后, 国内外学者们从入境旅游^[3]、旅游产业专业化水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771162); 湖南省国内一流培育学科建设项目 (5010002)

作者简介: 李竹 (1990—), 女, 湖南衡阳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生态经济。E-mail: 743268288@qq.com

吴卫 (1986—), 男, 湖南长沙人, 硕士研究生,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E-mail: link05@163.com

平^[4]和产业高级化^[5]等角度展开讨论,并取得丰硕成果^[6-8]。但一些学者提出旅游发展抑制经济增长的观点^[9]:旅游业与其他资源依赖型产业相似,具有资源空间分布不均、高度依赖旅游资源、依靠“出售”资源获取资金以及对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要求较低等特征^[10]。因此学者们引入“资源诅咒”命题^[11],提出可能存在旅游资源诅咒现象,即在旅游资源丰沛区(即旅游产业较高依赖区),旅游业通过对其他产业产生“挤出效应”阻碍区域经济增长的现象^[12],且实证研究发现一些较高依赖旅游业的经济体出现增速减缓或衰退情况^[13]。目前国内外主要观点包括:存在或一定条件下存在旅游资源诅咒^[14-15]和旅游资源诅咒具有生命周期^[2]等。国内外许多学者如 Andrew、Du、Lew 等以不同区域为研究对象,证明存在旅游资源诅咒现象^[16-19]。国内外的研究内容多元,如朱希伟、王玉珍、方法林和左冰等分别考察旅游业对工业、旅游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抑制作用及其传导机制^[20-23];其他学者则利用空间错位法开展研究^[24-25],李跃军等对“旅游资源诅咒”与“空间错位”的本质差别进行分析,认为两者的不同点在于“旅游资源诅咒”存在挤出效应^[26]。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多种方法,包括路径依赖模型^[12]、变异系数、旅游经济区域熵^[21]、系统 GMM^[2]和门槛阈值回归法^[27]等,地统计学分析方法较少使用^[14]。主要指标中,旅游产业依赖度是指区域经济发展对旅游产业的依赖程度^[13, 28-29],常选用旅游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表示^[29],用 GDP 增长率表示区域经济发展程度。此外,多数学者认为旅游业与经济发展呈线性关系,少数学者认为呈非线性关系^[2],即同时存在“促进”和“抑制”作用,如“N”型^[29]、倒“U”型^[28]。

在研究尺度上,多为国家和单个省级尺度,缺少战略区域类的中观尺度及多尺度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大多学者认同旅游与经济呈单一线性关系,仅少数学者提出两者关系存在正反两面,但缺乏对不同阶段的判断;在研究层次上,探讨传导机制方面多为总体层面,并未考虑分区差异和不同等级旅游产业依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基于 2002—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回归模型分析旅游产业依赖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判断总体和分区^①拐点,以及运用 B-K 中介效应分析法探讨总体、分区和分等级旅游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传导机制,这延伸了旅游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内容,为今后长江经济带制定旅游和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指标选择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各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2—2017 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3—2018 年)。其中删减缺失值较多的个别地级市,剩余 10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其余少数缺失数据主要通过查找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补齐,最后运用邻近年份插值法对剩余缺失数据进行处理。

文中的核心指标为旅游产业依赖度(RD)和区域经济增长率(G)。为避免其他因素造成影响,控制变量选择人口规模(POP)、经济水平(GDP)、产业结构(IDU)、物质资本投入水平(FI)、人力资本投入水平(HC)、技术创新(TI)、对外开放程度(OP)、政府干预程度(GI)、制造业发展水平(MD)、城镇化水平(UR)、市场水平(GP)和交通水平(HD);其中绝对量在回归模型中采用对数形式以减少影响。选择传导因素时,主要参考“旅游资源诅咒”和“TLGH”相关文献。根据“旅游资源诅咒”相关文献,旅游对其他产业产生挤出效应主要包括经济、制度和社会挤出等^[12],传导因素采用制造业发展、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技术创新、对外开放、政府干预等^[30]。根据“TLGH”相关文献,相关影响因素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政府干预^[13]和外贸投资^[31]等。基于此,本文传导因素选择制造业发展水平(MD)、物质资本投入水平(FI)、人力资本投入水平(HC)、技术创新(TI)、对外开放程度(OP)和政府干预程度(GI)。

2.2 旅游产业依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28-29],本文采用旅游产业依赖度表征旅游发展情况,GDP 增长率表征经济发展情况,均为核心指标,并运用回归模型考察旅游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公式如下^[13, 28-30]:

$$G_{i,t} = a_0 + a_1RD_{i,t} + a_2RD_{i,t}^2 + a_3RD_{i,t}^3 + a_{4-15}Z_{1-12} + \mu_{i,t} \quad (1)$$

$$G_{i,t} = b_0 + b_1G_{i,t-1} + b_2RD_{i,t} + b_3RD_{i,t}^2 + b_4RD_{i,t}^3 + b_{5-16}Z_{1-12} + \mu_{i,t} \quad (2)$$

式(1)和式(2)分别为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模型中增加 RD2 和 RD3 以考察旅游产业依赖度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a1~a3 和 b2~b4 系数验证旅游促进、抑制和复兴作用；Z1~12 为控制变量，a4~a15 和 b5~b16 为其系数；i 为地级市；t 为时间；μ 为误差项。本文选用的控制变量参考晁静等人^[32]，囊括绝大部分对经济具有影响的因素。

2.3 传导机制

本文参考薛雅伟等^[30]采用的 B-K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以旅游产业依赖度 RD 和传导因素 W 为解释变量，经济增长率 G 为被解释变量，计算 W 对 G 的影响程度 S，公式如下：

$$G_{i,t} = c_0 + c_1RD_{i,t} + c_2RD_{i,t}^2 + c_3RD_{i,t}^3 + c_{4-9}W_{1-6} + c_{10-11}Z_{1-2} + \varepsilon_{i,t} \quad (3)$$

式(3)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c1~c3 系数验证旅游促进、抑制和复兴作用；W1~6 为传导因素；c4~c9 为 W 对 G 的影响程度 S；Z1~2 为控制变量，为减少区域人口和经济差异对结果的影响，选择人口规模指数 lnPOP 和经济发展指数 lnGDP^[30]；ε 为误差项。本文选用的传导因素参考于邵帅^[33, 35]和邓涛涛等^[13]的研究，囊括绝大部分影响因素。

为进一步挖掘研究期间总体、分区和分等级旅游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率的促进、抑制和复兴作用阶段的传导路径以及探讨其传导因素的正负向和影响强度等问题，本文在 B-K 中介效应分析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以 RD 为解释变量，W 为被解释变量，计算 RD 对 W 的影响程度 γ，进而获得 RD 通过 W 对 G 的影响程度 Q。公式如下：

$$W = \gamma_0 + \gamma \times RD + \mu \quad (4)$$

$$Q = \gamma \times S \quad (5)$$

2.4 研究假设

本文构建旅游产业依赖度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率的传导机制模型(图 1)，分析研究期间旅游促进、抑制和复兴作用阶段的传导因素如何作用、作用强度和正负变化。参考以往文献和借助生命周期理论^[2, 12, 29, 35]，本文预设旅游促进、抑制和复兴作用现象的产生分别源于“红利效应”“挤出效应”和“复兴作用”传导机制，其中从旅游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阶段时，其传导路径发生转变^[12]，由“红利效应”转为“挤出效应”^[35]，另外可能存在向“复兴作用”转变的倾向。具体为：①研究前期为成长期，旅游业占经济比重较低，政府扶持旅游以获得更多收益；旅游红利吸引外商投资，促进国际合作；旅游业需要大量劳动力，且丰厚的利润吸引人才流入；旅游营销管理部门在利益的驱使下，加大物质资本投入；旅游联动效应可增加其他产业的外商投资、物质资本投入及科技创新，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为旅游促进作用阶段，表现为“红利效应”传导机制。②中期为过渡期，传导机制发生转变，传导因素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并出现抑制作用的因素。③后期为衰退期，旅游产业依赖度较高，问题逐渐凸显。单一资源产业更容易患上“荷兰病”，表现为旅游产业继续扩张和制造业逐渐萎缩；旅游业对劳动者教育层次的需求不高，人们在现有水平下能获得可观收入，因此不愿支付高额的教育成本；另外政府容易忽视相关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且影响科技创新；旅游业的丰厚收益可能诱使政府产生“寻租行为”和资源使用“机会主义”，资源被过度分配至旅游业，导致资源过度消耗和规模效率低下；为旅游抑制作用阶段，表现为“挤出效应”传导机制^[12, 29]。④最后为复兴期，旅游产业依赖度高区的工业基础较差，但

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富，且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旅游业增长促进经济增长，表现为“复兴作用”传导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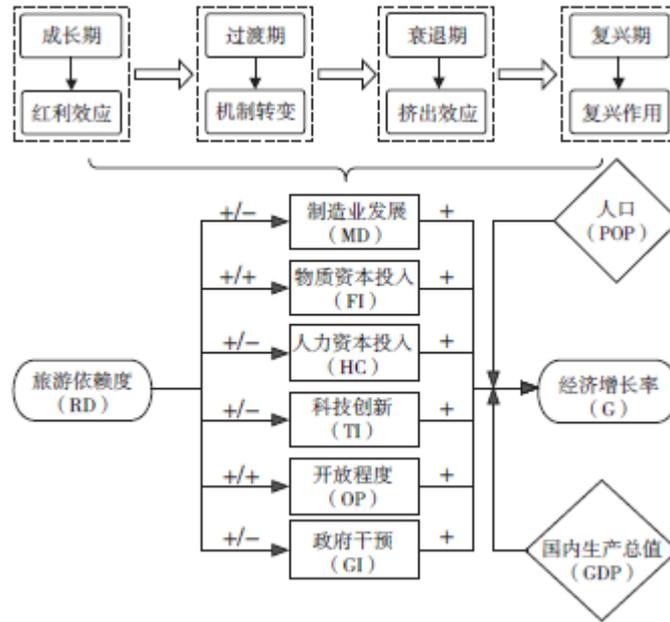


图1 传导机制模型

3 结果分析

3.1 旅游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率的时空变化

为了解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本文从时空维度观察两者的变化，初步判断其关系曲线。参考徐春红等^[29]研究，将旅游产业依赖度分为5个等级：较低依赖度（<5%）、低依赖度（5%~10%）、中依赖度（10%~20%）、较高依赖度（20%~30%）和高依赖度（>30%）；经济增长率按照自然断裂点分为5个等级：较低增长率（<6%）、低增长率（6%~9%）、中增长率（9%~11%）、较高增长率（11%~13%）和高增长率（>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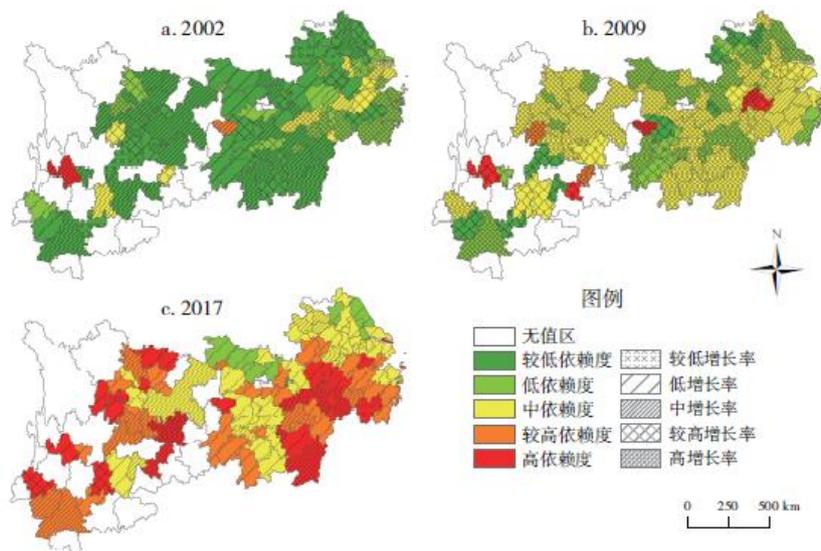


图 2 2002—2017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依赖度和经济增长率时空变化

由图 2 可知：2002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依赖度普遍较低，中依赖度较少；中、西部为低、中经济增长率，而东部存在较高、高增长率。2009 年，中、西部和东南部由低依赖度逐渐转变为中依赖度；除东南部经济增长率提前降低，其余区域增长率由东向西逐渐增加。2012 年，以原转变区域为核心，更多地级市进入中依赖度，但东、中部经济增速逐渐放缓。2017 年，中、西部更多地级市进入较高、高旅游产业依赖度；除西南部外的其余区域经济增长率降为低、中等级。说明各区旅游产业依赖度不断增长，但东中西部经济增速先升后降。旅游产业依赖度增长最快区多地处西部，包括巴中和安顺等，少数地处中部；增长最慢区多地处东部，包括上海和杭州等，少数地处中部；其余为增长适中区。

利用 Origin2018 和 MatlabR2018a 软件以旅游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率年平均值为基础分别绘制散点图和拟合曲线图（图 3）。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依赖度总体呈上升态势，从 5.49% 增至 26.64%。经济增长率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2—2011 年从 10.36% 增至 14.40%；2012—2017 年降到 8.51%。2008 年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汶川地震”等突发事件的影响，两者均呈轻微下滑。结合拟合曲线，可初步判断旅游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率为“N”型曲线关系，拟合度 R^2 为 83.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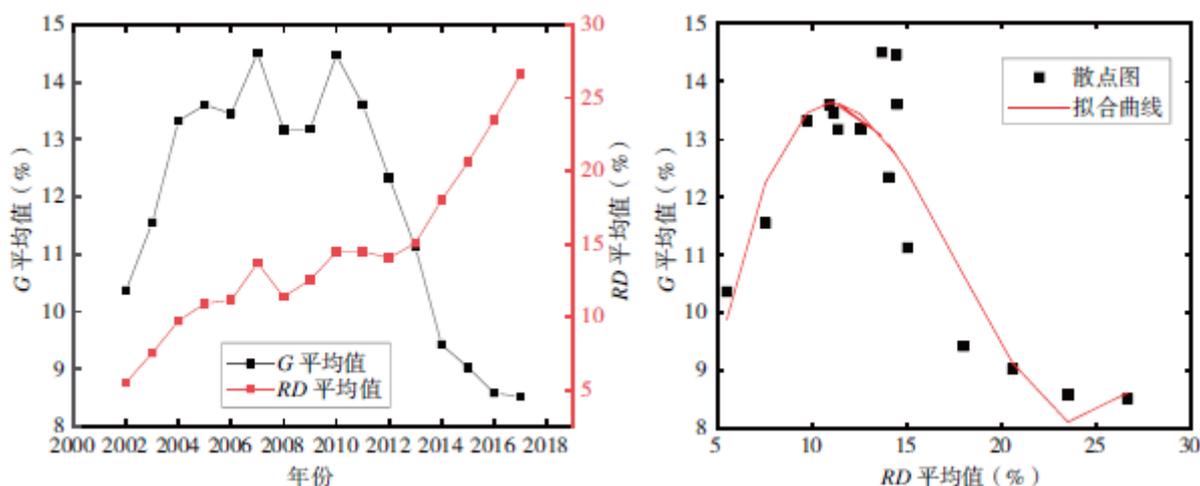


图 3 旅游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率年均值变化趋势、拟合曲线

3.2 旅游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首先，利用 Fisher-ADF 和 LLC 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数据均平稳。其次，运用 Chow 和 Hausman 检验方法选择回归模型：在随机和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中，总体区域 F 值为 33.39，Hausman 检验结果为 305.38；东部区域 F 值为 7.40，Hausman 检验结果为 67.55；中部区域 F 值为 19.99，Hausman 检验结果为 173.13；西部区域 F 值为 16.40，Hausman 检验结果为 191.28；均在 1% 水平下显著，都选择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再次，考虑滞后性会影响模型结果，且 SYS-GMM 适用于短面板数据分析，因此选择 SYS-GMM 进行动态分析，加上静态和动态固定效应 (FE) 及混合效应 (POOL) 模型进行稳健性分析。最后，利用门限面板回归模型估算拐点值。

3.2.1 总体分析

模型 1 和 3 (静态和动态 FE) 表明 RD、RD2 和 RD3 系数分别为正、负、正，且均显著，说明旅游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率影响呈“N”型。模型 5 和 6 (SYS-GMM) 显示，Hansen 检验值显著，AB 检验显示残差显著存在一阶自相关而二阶不相关，表明工具变量较为合理。模型 5、7 和 8 (SYS-GMM、静态和动态 POOL) 证明两者之间呈稳健“N”型曲线关系。根据门限面板回归模型

结果, 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旅游产业依赖度小于 6.24% 时, 具有积极影响, 为“旅游促进作用”阶段; 在旅游产业依赖度处于 6.24%~13.44% 时, 具有消极影响, 为“旅游抑制作用”阶段, 存在“旅游资源诅咒”现象; 在旅游产业依赖度大于 13.44%, 具有积极影响, 为“旅游复兴作用”阶段。

3.2.2 分区分析

长江经济带各分区研究结果中, 模型 4、7、8 和 11 显示 Hansen 检验值显著, 模型 4、7 中 AB 检验显示残差显著存在一阶自相关而二阶不相关, 工具变量较为合理。模型 1 显示 RD、RD2 和 RD3 系数分别为正、负、正, 但不显著; 模型 2 显示 RD 和 RD2 系数分别为正和负, 但不显著; 模型 3~4 仅加入 RD, 系数均为负, 但前者显著, 后者不显著。说明东部旅游对经济影响为潜在的倒“U”型; 东部为经济发达的地区, 主要依赖工业、金融和高技术等产业而非旅游业, 虽然旅游业发展较快, 但对经济影响较少, 因此东部旅游促进和抑制作用不明显。模型 5~10 显示 RD、RD2 系数为正和负, 说明中、西部旅游与经济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因为相比于东部, 中、西部经济落后, 经济发展更多依赖旅游业。

东部旅游与经济存在潜在的倒“U”型关系, 中部和西部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根据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结果, 拐点分别为 RD 值 12.72%、6.24% 和 5.94%。说明西部先于中部进入旅游抑制作用阶段。西部旅游资源富裕, 但经济发展水平最低, 急需发展旅游获得收入, 但因旅游发展步调太快, 忽略挤出效应, 影响经济发展, 提早进入旅游抑制作用阶段。

3.3 旅游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传导机制

首先, 利用 Fisher-ADF 和 LLC 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G、RD、MD、FI、HC、TI、OP、GI、ln-POP 和 lnGDP 均平稳。其次, 运用 Chow 和 Hausman 检验方法选择回归模型: 在混合和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中, 总体区域 F 值为 25.50, Hausman 检验结果为 418.13; 东部区域 F 值为 15.71, Hausman 检验结果为 131.56; 中部区域 F 值为 19.88, Hausman 检验结果为 259.84; 西部区域 F 值为 25.84, Hausman 检验结果为 165.99; 均在 1% 水平下显著, 都选择变截距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最后, 根据前文总体和分区曲线关系的结果选择在公式 (3) 添加 RD3。因篇幅有限, 本文节选传导因素系数展示。

3.3.1 总体分析

旅游产业依赖度通过物质资本投入、对外开放和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率产生积极影响, 表现为“红利效应”。RD-FI-G 系数为 0.15 和 0.68, 表明旅游业依靠投入物质增加旅游收入, 而物质资本投入可促进经济发展, 因此物质资本投入能有效地维持旅游促进作用或进入复兴作用阶段。RDOP-G 系数为 1.39 和 14.70, 表明发展旅游业能吸引更多外资、提高知名度、引进先进管理和运营方式以获取经验, 推动经济增长。RD-GI-G 系数为 0.64 和 6.87, 表明政府干预在维持促进阶段或进入复兴阶段具有积极作用, 未表现“寻租行为”。

旅游产业依赖度通过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率产生抑制作用, 表现为“挤出效应”。我国许多城市发展源于制造业的繁荣^[35], RD-MD-G 系数为-0.33 和 26.80, 说明长江经济带在发展旅游时占用制造业和其他产业生产所需物资, 不利于经济增长; RDHC-G 系数为-0.57 和 17.22, 表明旅游业能吸引大量普通劳动力, 挤压其他行业人才市场, 但高素质人才需求不多, 不利于构建合理的人才队伍; RDTI-G 系数为-3.05 和 115.60, 说明旅游发展对科技创新的需求低, 拉低总体科技水平, 阻碍经济增长。

3.3.2 分区域分析

由前文可知, 东部存在潜在的旅游促进和抑制作用, 主要源于经济更多受其他因素影响。东部 MD、FI 和 OP 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东部可通过加强制造业发展、物质资本投入及吸引更多外资推动经济发展, 避免旅游抑制作用。中、西部存在明显的旅游促

进和抑制作用。中、西部旅游业通过物质资本投入、对外开放和政府干预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抑制经济增长。中、西部科技创新影响程度远大于前两个因素，且西部制造业发展和人力资本投入影响程度小于中部，科技创新的影响程度则大于中部，说明中、西部旅游抑制作用的产生更多源于科技创新的影响，且西部受科技创新负面影响程度较大，因此比中部较早进入抑制作用阶段。

3.3.3 分等级分析

根据前文将旅游产业依赖度分5个等级讨论。较低旅游产业依赖度区(<5%)各传导因素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旅游业发展程度不高时，政府为了获得“旅游红利”，积极发展旅游，加大物质和人力资本投入，吸引外资，促进科技发展和制造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表现为“红利效应”。低旅游产业依赖度区(5%~10%)科技创新系数变为负向但不显著，各正向传导因素系数比较小，表明随着旅游产业依赖度增加，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慢慢浮现，积极影响逐渐降低，但依旧为“红利效应”。中等旅游产业依赖度区(10%~20%)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本投入、科技创新和政府干预系数为负且越来越显著，表明政府过度关注旅游业，忽视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源分配不合理，影响科技创新，不利于经济增长，更多城市由旅游促进作用阶段转变为旅游抑制作用阶段，表现为传导路径转变。较高旅游产业依赖度区(20%~30%)政府积极调整策略，加大物质资本投入，引进外资，一定程度缓解旅游抑制作用，但仍通过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本投入和科技创新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表现为“挤出效应”，存在“旅游资源诅咒”现象。高旅游产业依赖度区(>30%)政府干预的积极影响程度增加，制造业和技术创新的消极影响程度减少，系数分别从1.19、-7.03和-5.65增至3.27、-2.15和-2.65，能缓解旅游抑制作用；人力资本投入系数从-1.83降至-2.60，强化旅游抑制作用，表现为“挤出效应”，但存在向“复兴作用”转变的倾向。

4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①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总体旅游产业依赖度不断增加，由较低转为高依赖度；总体经济增长率先升后降；各分区两个变量时空维度特征各具差异。根据拟合曲线，初步判断旅游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呈“N”型曲线关系。

②长江经济带总体旅游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率呈稳健的“N”型曲线关系，拐点分别为RD值6.24%和13.44%，具有旅游促进、抑制和复兴作用阶段。中、西部呈显著倒“U”型曲线，东部呈不显著倒“U”型曲线。

③长江经济带总体旅游产业依赖度通过物质资本投入、对外开放和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率产生促进作用，通过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东中西部传导因素的影响强度具有差异。

④较低和低旅游产业依赖度区为“红利效应”传导机制。中等旅游产业依赖度区为传导机制的转变阶段。较高旅游产业依赖度区为“挤出效应”传导机制，存在“旅游资源诅咒”现象。高旅游产业依赖度区存在向“复兴作用”阶段转变的趋势。

4.2 对策建议

在长江经济带未来发展过程中，政府需要正确认识旅游促进、抑制和复兴作用形成的特点，借助旅游促进作用，调节产业结构，合理匹配资源，引入外商投资，吸引更多人才，缓解制造业压力。为缓解旅游抑制作用，东部需继续推动制造业发展、加大物质资本投入及引进外资；中部需更加关注旅游对制造业和人力资本的影响；西部需重点利用高科技发展旅游。各等级旅游产业依赖度区需强化各正向因素，关注负向因素，促使负向影响转为正向影响。总之，长江经济带可借鉴研究结果，调整旅游产业依赖度，强化不同因素，使其处于促进或复兴作用阶段。本文分析各类旅游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对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但还存在以下不足：本文仅讨论单向关系，今后可尝试研究双向关系；研究

尺度可延伸至县域尺度；内在机理的研究还需继续深化。

参考文献:

- [1]陆大道. 建设经济带是经济发展布局的最佳选择——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J]. 地理科学, 2014, 34(7):769-772.
- [2]曹翔, 郭立萍. 中国旅游业发展导致了资源诅咒效应吗?[J]. 旅游学刊, 2017, 32(5):14-25.
- [3]张世兵. 湖南省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 经济地理, 2013, 33(7):182-186.
- [4]赵磊, 王佳. 中国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J]. 旅游科学, 2015, 29(1):40-57.
- [5]陈太政, 李锋, 乔家君. 旅游产业高级化与旅游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 经济地理, 2013, 33(5):182-187.
- [6]Santamaria D, Filis G. Tourism demand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pain: New insights based on the yield curve[J]. Tourism Management, 2019, 75(6):447-459.
- [7]Durbarry R.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in Mauritiu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3):862-865.
- [8]Henry E W, Deane B. The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to the economy of Ireland in 1990 and 1995[J]. Tourism Management, 1997, 18(8):535-553.
- [9]Ghalia T, Fidrmuc J. The curse of tourism?[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2018, 42(6):979-996.
- [10]邓涛涛, 王丹丹, 刘璧如. “资源诅咒”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综述与启示[J]. 旅游学刊, 2017, 32(11):60-68.
- [11]Auty R.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M]. London: Routledge, 1993.
- [12]李文静, 张朝枝. 基于路径依赖视角的旅游资源诅咒演化模型[J]. 资源科学, 2019, 41(9):1724-1733.
- [13]邓涛涛, 刘璧如, 马木兰. 旅游产业依赖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检验[J]. 旅游科学, 2019, 33(1):1-17.
- [14]瓦哈甫·哈力克, 辛龙, 李振江, 等. 旅游资源诅咒时空分异及驱动力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 GWR 模型分析[J]. 生态经济, 2019, 35(2):160-167.
- [15]Po W C, Huang B 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A nonlinear approach[J]. Physica A—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2008, 387(22):5535-5542.
- [16]Andrew B P. Tourism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rnwall[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7, 24(3):721-735.

-
- [17]Du D, Lew A A, Ng P T. Tourism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6, 55(4):454-464.
- [18]Juan C P, Sanchez S M, Ignacio P J. Does tourism growth influ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5, 54(2):206-221.
- [19]Lu C Y, Pang M, Yang J Q, et al. Research on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Case of Qingyang, China[J]. Sustainability, 2018, 10(11):4033.
- [20]朱希伟, 曾道智. 旅游资源、工业集聚与资源诅咒[J]. 世界经济, 2009, 32(5):65-72.
- [21]王玉珍. 旅游资源禀赋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研究: 基于山西的实证分析[J]. 生态经济, 2010, 26(8):41-45.
- [22]方法林. 江苏旅游“资源诅咒”现象实证研究[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 34(5):27-34.
- [23]左冰. 旅游能打破资源诅咒吗?——基于中国31个省(市、区)的比较研究[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3, 33(5):60-69.
- [24]丁旭生, 李永文, 吕可文. 基于空间错位理论的河南省旅游发展区域差异研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1, 27(2):106-108.
- [25]韩春鲜. 基于旅游资源优势度差异的新疆旅游经济发展空间分析[J]. 经济地理, 2009, 29(5):871-875.
- [26]李跃军, 周秋巧, 姜琴君. “旅游资源错位现象”与“旅游资源诅咒”辨析[J]. 旅游论坛, 2018, 11(2):43-50.
- [27]Deng T T, Ma M L, Shao S. Research note: Has international tourism promote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 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 approach[J]. Tourism Economics, 2014, 20(4):911-917.
- [28]李秋雨, 黄悦, 刘继生, 等. 广东省旅游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空间态势[J]. 经济地理, 2015, 35(5):185-191.
- [29]徐春红, 丁镭, 董鸿安, 等. 浙江省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时空格局及影响机理[J]. 旅游科学, 2017, 31(5):82-95.
- [30]薛雅伟, 张剑, 云乐鑫. 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传导要素萃取与“资源诅咒”中介效应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 2019, 27(6):179-190.
- [31]魏后凯.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02, 37(4):19-26, 92-93.
- [32]晁静, 赵新正, 李同昇, 等.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经济差异演变及影响因素——基于多源灯光数据的比较研究[J]. 经济地理, 2019, 39(5):92-100.
- [33]邵帅, 杨莉莉. 自然资源丰裕、资源产业依赖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 2010, 26(9):26-44.
- [34]赵磊, 唐承财. 产业结构变迁、旅游业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资源科学, 2017, 39(10):1918-1929.
- [35]邵帅, 范美婷, 杨莉莉. 资源产业依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效率?——有条件资源诅咒假说的检验及解释[J]. 管理世界,

2013, 29 (2) : 32-63.

注释:

1 主要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块: 东部区域包括上海、江苏和浙江, 中部区域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 西部区域包括四川、重庆、贵州和云南。